

## ※ 序跋選錄 ※

# 真實之城與想像之城——《建康內外： 南朝作家的都城書寫與空間想像》 前言

祁立峰\*

## 一、安全、神聖、繁榮之城

### (一) 空間作為象徵

美國學者萊漢 (Richard Lehan) 在其《文學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饒富興味的說法，他認為「城市以及關於城市的文本，彼此有著不可分離的歷史，而閱讀城市本身，同時也是另外一種文本式的閱讀」<sup>1</sup>。至於另外一位美國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 (Yi-fu Tuan)，對空間與其作品，則提出了關於特定地景會存在「親切經驗」的說法：

親切經驗感是難以表達，但非不可表達的。它可能是深切私人感受，但不必是唯物中心主義或偏離中心的——爐床、避難所、家或家的基地，都是讓人們感到親切經驗的所在 (place)，它們存在著的激昂與特殊性經常成為詩歌或散文的主題。<sup>2</sup>

正如段義孚所說，如此對特定「地方」的「激昂與特殊性」，成為詩歌或散文的主

---

\* 祁立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sup>1</sup>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289.

<sup>2</sup>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140。筆者亦參酌本書之英文版：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題，我們如果將此延展來解讀，對於城市的閱讀，除了親身履踐，也可以透過細讀文本的方式來理解一座城市。更進一步來說這樣真實與想像的課題，「城市」不僅是真實的地理景觀、存在於現實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它如何透過建構「被說／寫出來」。

時至當代，隨著我們對於「空間」討論的深化和理論化，「空間」從一實際的地理指涉，轉而與感覺、心靈、時間等概念相關，甚至也與國家認同、意識形態、權力場域等等都有關連。那麼，回到文學研究的脈絡，我們可以透過作品對於「空間」的書寫、想像、再現，去思考此空間帶給作者的意義與其後的寓言。在筆者過去的研究中，主要關注於魏晉南北朝文學這個斷代時期，在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專書之中，筆者以《相似與差異：論南朝文學集團的書寫策略》為題，談寫作者如何面對內容與形式的選擇與組合，呈現如其時的繁複風格。在此之後，筆者在專書《遊戲與遊戲之外：南朝文學題材新論》中，則嘗試從遊戲的角度，切入南朝幾個如詠物、物色、邊塞、艷情、遊寺等特殊題材，論其與遊戲，與接受或逃逸於現實的複雜辯證關係<sup>3</sup>。

在本書中，筆者希望更進一步回到現實，或更聚焦來說，是回到現實世界裏的空間，從南朝寫作者對於他們的「都城建康」之書寫，並聚焦於都城的「內」與「外」，譬如建康以西的荊楚地帶；文人遷徙宦遊時途經的江州地帶；周遭遊覽時的佛寺遺跡；孫權故城，或更早的吳越館閣等等的地景，作為本書立論的核心。這一切的書寫無論聚焦或側寫、核心或邊緣，大抵上皆與都城或對照空間有關。故本書題目定為「都城內外：南朝作家的都城書寫與空間想像」，希望能借用當代關於地理與空間的相關理論作為比附，作為研究觀點，將重點放在南朝作家對於城市地景的寫作，提出結合文學與文化面向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從我們熟悉的六朝詩歌辭賦，談出一些具當代文化意涵的弦外之音。

眾所周知，過去論及六朝詩歌文學時，往往重視其山林和山水書寫，尤其時至

<sup>3</sup> 關於此段提及的筆者兩部拙著，《相似與差異：論南朝文學集團的書寫策略》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通過口試，2014年政大出版社出版；至於《遊戲與遊戲之外：南朝文學題材新論》則為筆者升等副教授之專著，於2015年由政大出版社出版。

南朝，「莊老告退，而山水方茲」<sup>4</sup>。而無論《詩品》說的「巧構形似」<sup>5</sup>，《文心雕龍》談的「感物」或「物色」，似乎都與山水自然經驗連結在一起。但這概念的另外一面，其實是與山林相對的城市經驗。我們知道一座城市本身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庶民社會風貌，即有著高度意義，當之被寫作而進入到文學作品之中，呈現的城市風貌更是意象豐富而充滿寓意。同時，當一篇文學作品，一旦與時代、空間彼此指涉的同時，其背後所牽扯到一連串的作者意圖、心態、時代氛圍，空間再現，自然層層重疊，呈現相當複雜而盤根錯節的寓意。

另一位英國的人文地理學者柯蘭 (Mike Crang)，在論「文學地景與地方感」時說：「文學不因其主觀性而有缺陷；相反地，主觀性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sup>6</sup>關於這樣通過人文地理學來理解地景，而非限地或實景考據的方式，學者如鄭毓瑜也有卓越之詮釋：

當空間成為社會關係的產物，或者出現充滿情感的地理學書寫，首先讓文學文本相關的空間的描繪可以脫除「太主觀」或「不科學（不是地理事實）」的世俗認定，文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住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其次，正因為破除了主／客觀或現實／想像的二元分界，空間無法單純被反應，同樣也無法完全被編造，這應該是個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文本世界。<sup>7</sup>

空間是存在於現實生活的，但當空間被作品給再現之時，它又具備了文學性與超現實的定義。它「無法被完全編造」，卻也不能全然再現複製。在本書的架構中，筆者未必引用柯蘭的理論原文，但在概念與觀點上參酌了這樣的研究方法，將城市的

<sup>4</sup> 這是《文心雕龍·明詩篇》著名的說法，本書徵引的版本為〔梁〕劉勰撰，〔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臺北：世界書局，1967年），頁16。本書其後皆引自此版本，僅注明黃氏校注與頁碼。

<sup>5</sup> 「巧構形似」是鍾嶸《詩品》的關鍵概念，本書徵引的版本是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年），其後同樣皆引此版本，僅注明王氏之箋證與頁碼。

<sup>6</sup> 柯蘭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的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58-59。

<sup>7</sup> 鄭毓瑜：〈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16。其後如〈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與〈市井與圍城：南朝宮廷文化之一側面〉等篇章，筆者亦徵引自此，為了避免贅述，後文僅注明書名與頁碼。

地理現實，與時間、空間不同面向的記載與文本結合。柯蘭在其書中談到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談雨果 (Victor Marie Hugo)、巴爾札克 (Honoré de Balzac) 之於巴黎的關係，談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 之於倫敦的關係<sup>8</sup>，這是從文學作品到地理學的考察。這也就是鄭毓瑜說的「個人與空間的相互定義」<sup>9</sup>，作品被視為考察地理學、城市流變、庶民生活的佐證之一。

但若再從「寫作者」的角度來說，當作家在其作品之中，敘寫一座（真實或想像的）「城市」（或更進一步來說，當文學再現時，再如何宣稱真實的書寫，難免有想像和虛構的成分）。那麼，這樣的摹寫敘述城市的文本，帶給作家什麼意義？我們知道一座城市提供居民居所，但居民生活在城市之中，也反身建構了一座城市。那麼，創作者與其書寫當然可以作為「空間」的佐證，但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到：「空間」如何反過來成為干涉因素，影響創作者的書寫？而寫作者與空間又如何相互召喚？

更重要的是——當一位心靈敏銳、甚至足以感受到時代變化徵狀的寫作者，見證了城市建構的雄偉，或見證都城經歷的毀滅，以及見證不同州郡或荒原廢城的遺址時，對於他們的精神、心態或認同又產生什麼變化？因此，在本書中以空間為切入點，又不僅只是要談空間的變異與書寫前後的差異，而希望將視角延伸到心態史、觀念史與文化研究等諸面向，更進一步建構一座城市或一處地景在文學作品中的模樣，以及此間再現與想像的寓意與隱喻。

## （二）構成城市的要素

本書的架構大抵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在前三章，本書分別以「安全之城」、「神聖之城」與「繁榮之城」為標題，從江海的描寫、宗教的地景，以及繁榮享樂的富庶，聚焦來談南朝的都城「建康」，觀察南朝寫作者筆下的建康金陵城如何展現其安全、神聖與繁榮三個側面。須說明的是此三面向並非筆者自創發想，此處主要參考了美國城市研究學者克特金 (Joel Kotkin) 於《城市的歷史》(*The City: The Global History*) 一書中，所舉出的三要素。此處須說明的是：克特金主要談的是西方過去到現代的幾個大城市，在他的書中談到的東方城市，則聚焦於十世紀之後的

<sup>8</sup> 柯蘭著，王志弘等譯：《文化的地理學》，頁 59-70。

<sup>9</sup> 鄭毓瑜：《文本風景》，頁 16。

城市，且僅是略而一談。筆者也並非全然認同城市的興起非得是此三個因素不可。但《城市的歷史》對本書的意義在於，明確地標記出歷史名都的三個指標，透過此指標，足以來考察古典時期的城市興衰。因此此處借用克氏之概念，作為本書前一部分的架構，這並不表示筆者對其論點全然服膺。根據克特金對三因素的解釋：

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記下這些重要城市的潮起潮落：「那些強盛一時的城市如今多半風光不再；那些一度微不足道的城市如今欣欣向榮。由此可見，同一個地方不可能永遠富足興旺，兩種地方皆可不忽略。」……然而希羅多德面臨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如何壯大城市，城市又為何逐漸凋零？本書提出決定城市興衰的三大要素：具備宗教場域、提供庇護及施展權力、刺激貿易活動。<sup>10</sup>

對應《城市的歷史》序言的標題：「神聖、安全、繁榮之地」，宗教場域即是「神聖」，「權力與庇護」則是「安全」，而貿易商旅則是「繁榮」。這三者構成作者所謂的「城市三要素」。克特金進而針對每一個面向分別進行更深入的說明：

宗教場域：

長久以來，廟宇、教堂、清真寺、金字塔等宗教建築，都是大城市重要的一景並占據人類對城市的想像。這些建築說明城市亦為神聖之地，與統治世界的神聖力量相互聯繫。……史學家林區 (Kevin Lynch) 指出：「攝人的景觀是城市的骨架」，市民將「據社會意義的神話」建於其骨架之上。

安全庇護：

防禦系統也對城市長治久安舉足輕重。城市的首要之務就是維持治安。史學家皮朗 (Henri Pirenne) 的研究指出：很多城市最初是避難所，供人民躲避遊民掠奪或歷史上各地皆有的不法行為。若城市無力維持治安，例如西羅馬帝國末期，居民將遷至內陸地區或移居到另一個較為安全的堡壘城市。

交易場所：

光有宗教場域和安全庇護所，尚不足以建立大城市。祭司、士兵、官吏提供了繁榮市鎮的先決條件，但卻無法創造足夠的財富，長期供養廣大的人口。為達到此目標，必須仰賴工匠、商賈、工人，以及歷史上許多地方皆有，直至近代才廢除的奴隸制度。上述這些人占城市最多人口。資本主義一崛起

<sup>10</sup> 克特金 (Joel Kotkin) 著，謝嫻文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頁3。

時，他們（指工匠、商賈與奴隸）即為最初的城市建造者。<sup>11</sup>

此處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從克特金最末關於「資本主義崛起」的論述也可以發現，他將「繁榮」繫於工業革命之後。但本書第二章所論的「繁榮之城」，亦不僅只談城市中的人口、商賈或奴隸造就的當代思維下的經濟成長和繁榮，更包含建康對過去都城譬如長安、洛陽的複寫，以及這樣的複寫成為記憶之後，對於六朝寫作者心態的影響。此外，西方受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城鎮以教堂為中心建立，這也不同于古典中國的都城概念。然而筆者強調的是，此處援引理論不過作為比附與啟發，而放在本書的架構中，這樣的概念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發在於：過去的文學研究就作品論述；歷史研究專注於空間的變遷；而城市理論則基於現實的空間，但筆者將城市與作品結合，從文學的專業出發，以文學作品為主軸，旁及史料傳記，因此重點在於文學背後之「想像」與「再現」。

從架構來看，本書所設定的第一、二、三章，即便三個主題確實來自於《城市的歷史》一書，但並不代表筆者認同該書足以涵蓋西元三至六世紀的中國都城。然而即便「安全」、「繁榮」與「神聖」涵蓋或許不同，但我們如今在描述南朝都城建康的文學作品中，仍能發現到相關的特徵。至於本書的第四章，則專門聚焦於金陵遭受的浩劫與毀滅——即發生於西元五四八年的侯景之亂，以及在毀滅進行式之中、在毀滅之後，寫作者的創傷經驗與傷痕記憶。

## 二、都城毀滅記事

在上一節的論述中，筆者徵引了兩段文獻，其一是段義孚談人對於自己熟悉的、長期居存的「地方」所產生之親切感；其二則是鄭毓瑜認為，因創作者秉持著這樣對「地方」的「情感的地理學書寫」，所以雖然空間的測繪與書寫，本身可能遭受流於主觀以及不夠科學的質疑，但卻展現了創作者與空間相互定義的、一個更廣義的文本世界。

但從反面來說，熟悉的空間若對人有深切的親密感受，當它毀滅所帶來的悲傷與創痛，恐怕是難以言喻的，也是不可再現的。而從精神分析理論來說，當我們遭受極大創傷而無以反應時，會將之壓抑並延宕，這樣的創傷會在日後以其他的徵

<sup>11</sup> 同前註，頁 4-5。

狀來表現，這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創傷延遲反應」<sup>12</sup>；同時也是拉岡所謂的「能指鍊」與創傷的回溯性<sup>13</sup>。這成為人們產生精神異常的起源。因此，即便本書中筆者以「空間」描寫作為主題，又同時借用了精神分析的理論，但都僅是作為比附。對寫作者而言，所依存的都城經歷毀滅，這是慘痛的創傷經驗，而這樣的創傷經驗一旦表現在作品裏，就成為一種追憶，成為創傷延遲的反饋。這是筆者最主要的立論，也是本書之所以在第四章聚焦談都城所經歷的浩劫，以及在這場浩劫帶來的毀滅「前」、「中」、「後」，那些被糾結捲入、留下相關作品的旁觀者和倖存者。

在侯景之亂(548)後，我們大概可以說建康城的安全、繁盛和神聖三要素遭到了嚴重破壞，人口僅剩原本的十分之一二。在毀滅之前，有部分六朝的作者就已經預先描寫城市的興衰與毀滅；但在毀滅之中，許多見證者與旁觀者，親歷了浩劫毀滅的一刻；而在毀滅之後，空間所帶給人的「地方的熟悉親切感」(段義孚語)已經蕩然無存了。反身來說，空間的毀滅帶給寫作者的剩下創傷的延遲反應，留下不可抹滅卻又難以再現的傷痕，這種傷痕成為一種能指，透過這些能指與創傷的回溯，我們可以找到發生創傷的原初場景。

關於這些理論與假設，請容後本書實際舉例時，再進一步來討論。但筆者以為透過精神分析，其實能夠相當合理地詮釋六朝這些寫作者他們的心靈和精神狀態。誠如上述，有部分的寫作者，能夠在災難「未曾到來」、「尚未到來」或「即將到來」之前，預先進行書寫(或許類似我們今日所謂的「既視感」或「亡國感」)。與此相關的概念，讓人聯想到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謂的「讖象」

<sup>12</sup> 弗洛伊德認為：透過創傷延遲反應，傷痕會在記憶中呈顯與再現。關於創傷延遲反應(deferred action)的說法，筆者參見 Sigmund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 *Pre-Psycho-Analytic Publications and Unpublished Drafts (1886-1899)*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p. 367。

<sup>13</sup> 拉岡(Jacques Lacan)的相關論述，筆者參考了幾篇重要著作，譬如 Jacques-A. Miller, ed,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另外也參考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k. 17,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Russell Grigg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7), pp. 31-38 談的「逆動關係」(即本文的「回溯性」)，此外，Christine van Boheemen, *Joyce, Derrida, Lacan and the Trauma of History: Reading, Narrative, and Postcolon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0-154 談「原初場景」的部分，以及褚孝泉譯的《拉康選集》(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當中〈主體的顛覆和佛洛伊德無意識概念中的慾望辯證法〉文中的四個圖式中的第一個：能指鍊與回溯性創傷經驗的討論(頁614)。

(omen)，但更接近一種對浩劫與毀滅的吟詠與癡迷。

這種創痛與末世感輪流串演的舞臺效果，背後反應了什麼樣寫作者的心靈圖景？過去並非沒有學者處理類似的議題，譬如洪順隆《六朝詩論》中，就曾經討論謝朓(464-499)詩某種獨特的「危懼感」<sup>14</sup>；而歷史研究也經常提到因六朝特殊的政治社會氛圍，貴族階級產生出的集體焦慮以及所引起的精神異常，「任何娛樂若沒有勞動以為調劑，俄頃之後，就不能引起神經的反應，而失去滋味。這時候他們要刺激疲勞的神經，非用新娛樂不可」<sup>15</sup>。當然，此處「神經疲勞」之討論，可能會流於某種變態與異常的心理狀態，近似於精神疾病。但人與空間一旦產生依存，當其離鄉歷劫同時，難免造成創傷、憾恨與不可逆的生命經驗瓦解。而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樣的書寫與傷痕呈現，本身就有其不可再現甚至是自我療癒的特性。前一段說到具有「危懼感」的謝朓，在他即將離開荊州的〈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是這麼寫的：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梟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歎吧。沉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sup>16</sup>

從謝朓這篇牋文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可能有自謙誇張的成分，但「渤澥方春，旅翮

<sup>14</sup> 相關論述可參酌洪順隆：〈謝朓作品中所表現的「危懼感」〉，《六朝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頁194-230。

<sup>15</sup>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1975年），頁150。

<sup>16</sup>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可見於《文選》，但此處為求與後文統一，引自〔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921。本書所徵引之六朝文甚多，可見於《文選》、《藝文類聚》、《歷代賦彙》等，但今避免贅注，統一徵引自嚴可均輯本，以後僅注明為嚴輯與頁碼。

先謝」、「輕舟反溯，弔影獨留」，離開知己所在的場所，離開向來熟悉親切的地方 (place)，而危懼、不安、感傷和不知從此將如何的茫然，隨之而來。空間本是無情物，但由於寫作者敏銳的心靈，加上對其所依賴的地方感之親近和依存，讓空間書寫變得格外的靈動、鮮活而深刻。

當寫作者依存某一處地景場所時，他即目所見無非「三江七澤」或「鶯飛草長」<sup>17</sup>，但一旦當空間發生變化（遷徙）與浩劫（毀滅）時，我們可以在作家的紀錄裏，看到各種複雜的情感——此處「皋壤搖落」、「歧路西東」僅是分離時的感喪而已。當都城遭遇巨大毀滅，當浩劫鋪天蓋地而來，寫作者所呈現各種劇烈之感受，將一一透過作品呈現與再現出來。包括創傷的寫實與虛構，想像與再現，包括對毀滅感的焦慮，恐慌與它最後終將發生的期待。阿多諾有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且詩也不再成為可能」<sup>18</sup>，但經歷浩劫的作者仍然寫詩，仍然試圖再現他們所見所感，所處所依，無論想像的或虛構的空間和地方。

由於本書的第四章專論城市毀滅以及衍生的創痛，到了第五與第六這兩章，則聚焦來談空間變化、遷徙、宦遊對於寫作者的影響，以及這些在權力核心（都城）之外的空間，如何被書寫而再現其地方意義。

### 三、被權力核心包括在「外」<sup>19</sup>

#### （一）地景作為一種對照組

「空間」相關的研究之所以引人入勝，筆者以為很大的原因在於空間給予寫作

<sup>17</sup> 此句引自丘遲著名的〈與陳伯之書〉，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284。

<sup>18</sup> 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的原文是 “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und das frißt auch die Erkenntnis an, die ausspricht, warum es unmöglich ward, heute Gedichte zu schreiben”，但這句德文翻譯向來頗為歧異，最常見的翻譯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詩已經不再成為可能」，就筆者理解其意，應該是指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大浩劫之後，已經比任何文學作品能夠再現的慘況都還要更嚴峻。當恐怖的現實超越了想像力極限時，我們已經無法再寫詩。其後學者將之解讀成為一種「創傷的不可再現性」（或說無法完整、忠實地呈現創傷），關於此點，在本書第四章將進一步討論。

<sup>19</sup> 此處「包括在外」這個不符合語法習慣的用語，筆者的啟發是王德威談「華夷風」時的用法，參酌氏著：〈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野〉，《中國現代文學》第 34 期（2018 年 12 月），頁 18。根據王德威的說法，此用法最早見於張愛玲 1979 年於聯合副刊的文章。當然，王氏原本之

者的印象、記憶或想像，原本就是多元的、歧義且繁複的。過去談六朝山水詩已經有一個說法：認為若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這些繁複雕琢的語言文辭，其實有一個意義在於去逼近外界事物的紛紜迷濛<sup>20</sup>。而過去現象學還有另外一個著名的概念，即所謂的「時間的空間化」<sup>21</sup>（或反之「空間的時間化」也可以成立），亦即論空間必須與時間維度連結。在古典時期諸多詠史懷古的述情之作，大抵上都掌握了這樣的特徵。

此外，所居住、依存、變遷的空間概念，除了對照寫作者的繁複的心靈空間之外，尚有另外一個關鍵在於邊緣與核心的差異。且即便我們身處於不在場的現場，同樣可能受到該空間的連動影響。前述談的都城歷劫之時，有些不在場的寫作者，對比了其他的城市經驗。意即是，身處異地的寫作者，同樣受到空間的影響。而身處邊緣空間的作者，又同時受到中心空間的驅動。因此在本文的第三個面向，即處理六朝內部的「東／西」空間的差異。如果說建康揚州代表的政治權力核心，所處的方向是東方；那麼江州、荊州、雍州與益州這些相對於邊緣的空間，則屬於西方。本書的最後兩章就希望立基於都城中心論的角度，來觀察寫作者的「西方書寫」。筆者嘗試以「都城」作為核心，從立基邊緣的空間（荊州），經過中介的空間（江州），重新觀察六朝的這些寫作者，如何將西方空間放在與都城對照的位置。

而再進一步來申說，空間對於寫作者有其召喚性。筆者指的並不是南朝這些士人受到空間感召而自願前往。就如今所見詩文來看，這些寫作者大多出於宦遊，由於身為僚佐或府官，而追隨刺史諸王前往國境之西；又或者同樣是受到政治權力約束，陪同府主前往遊覽。這苦辛的行旅多半出於無奈，這看似歡愉的遊覽背後也難免有政治權力結構。但筆者所謂的「召喚」，指的是相對於都城這樣「中心的」空

---

論述有其脈絡，但簡而言之，過去的「用夏變夷」或「外其國而內諸夏」等等，都是將「夷」排除在外，而王氏之見則以一種更廣義、更大範疇的遺／民論述，將之「包括在外」（在語法上形成刻意的矛盾）。此處筆者所指的就是包括在南朝之內，卻又實則在建康之外的其他地帶。

<sup>20</sup> 關於此點，筆者參酌的是蕭馳：〈南朝詩歌山水書寫中「詩的空間」的營造〉，《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年3月），頁11。

<sup>21</sup> 關於此點，筆者參酌了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頁1-32；王建元：《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171-200；以及鄭文惠：〈杜牧詠史詩之時空結構——以時間空間化為論述主軸〉，《政大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12月），頁149-192。本書並沒有徵引此論，此處一提而已。

間，「安全的」空間，甚至是「理性的」空間；都城西境的江州和荊州，成為遊戲的空間，邊塞的空間，抑或說感性迷信的空間。鮑照(414-466)、蕭繹(508-555)都寫了許多的遊戲詩歌，而在文學遊戲的同時對邊塞意象進行仿擬。陰鏗(511-?)、何遜(?-518)的行旅詩歌中，山水景物都有一種荒蕪空寂的色彩，有著不完整、不完美與未完成的特徵，猶如日本禪宗獨特的美學「侘寂」(wabi-sabi)。而前面談過的謝朓，在荊州往返揚州的路途中，則將兩地做了明確的對照與呼應。

當代空間理論提醒我們：任何空間都是權力的，背後有權力運作的結果，也有來自於國族、意識形態的認同課題。但身處邊緣或核心的空間，所感受到的權力敞視自然有所不同，更進一步來說，即便身處空間感受到在地的權力，但空間權力、政治權力（甚至再加上不同場域所賦予的民俗權力、宗教權力）等等，彼此交錯羅織，而形成作者進入空間的獨特感受與複雜體驗。這可能必須要深刻且細膩的疏離，才能一一爬梳。而這也就是筆者借用王德威的觀點，提出了「包括在外」這樣的概念<sup>22</sup>。當我們身處地景之內，感受到的一切有真實也有想像；但當我們身處中心空間之外，卻依舊受到都城的影響、連動或牽引，這正是寫作者所感受到複雜的空間影響與寓意。

## （二）相關文獻回顧

本書在撰寫時除了參酌前述所談到的現當代之空間理論，同時也參考關於六朝都城的相關論述，以及對於南朝荊州、江州地帶的文化文學論著，此處舉出幾篇與本書密切相關的論述進行評述。至於其他的前行研究，於本書其後在每一個章節實際舉證、論述的部分，將會進一步提及。

首先在論南朝都城建康的地域、空間、城市、經濟發展等現象與資料時，筆者有很大一部分參酌了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sup>23</sup>一書，其首章〈建康與六朝歷史的發展〉中，所談到包括都城地理位置的險要，都城中心意義的確立，以及都城所在揚州與荊州在政治與軍事力量的頡頏，如提到荊州刺史的「分陝」，以及元嘉時期將荊州再另立雍州等史事，有助於本書論述詩賦作品中提到建康與荊雍地帶

<sup>22</sup> 王氏之論請參見註腳 19。

<sup>23</sup>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關於徵引之頁碼，其後論文將進而述及。

的對位關係。另外其第二章〈六朝建康城的興盛與衰落〉，對建康尤其臺城內部的地形、宮室演變等等有深入描述。至於第三章至第五章〈六朝建康的經濟基礎〉、〈六朝建康的園宅〉以及〈六朝時代的建康——市廛、民居與治安〉等等，在本書論述城市的繁榮與富庶部分，提供了許多基礎的文獻資料，包括實際的行政地理、商業數據等，皆令筆者的論述有足資對照的佐證。也基於建康城的繁榮與商業活動，在本書第三章〈繁榮的都城〉中，才能進一步推論南朝都城建康與兩漢都城長安、洛陽之間的比較與聯想關係。

其次，鄭毓瑜《文本風景》<sup>24</sup>中的〈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市井與圍城——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以及〈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這三個章節，筆者參考甚多。《文本風景》一書提出了人文地理學觀照之下的空間，被傳統地理學認為「不科學」或「不客觀」，但鄭毓瑜也提到正是這樣的「不客觀」，呈現出了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相互指涉的特徵，此點給予筆者頗重要的啟發。在本書對空間的探討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些親身見證過都城毀滅與否的寫作者，他們無論身在何處，同樣受到此空間的影響；甚至此後數百年，金陵的意象，南朝的終局，成為詩人墨客吟詠感懷的重要意象。過去我們常說所謂的懷古詠史之作，有一種弔古傷今的體貼，或借古諷今的旨趣。

但其實反身來說，這正是空間被重新書寫，被再現、再脈絡化以賦予意義的徵狀。在〈市井與圍城〉中，鄭氏引用巴赫汀的狂歡節儀式，來補充南朝的俗趣，談到南朝市井氣質反面的特權建構；而在「哀江南」論述中，建康的衰頹、南朝的覆滅，成為爾後明清之際遺民的永恆場景。這些論述都給予筆者在思路上的啟發。如果我們說「時間」有「空間化」的可能性，而同理，空間的書寫也可能被「時間化」，成為歷代士人再現過程中，與現實地理學無涉的一種「共時性」。在都城建康毀壞之前，它是如此神聖、繁榮且穩固。這樣的穩固與恢宏，我們可以將之遙想成為漢魏的兩京與三都。但在此同時，像「蕪城」或「吳城」這樣已成丘墟的城市，又如此深刻打動敘事者。「一世異朝市」<sup>25</sup>而歸於空無的意象太令人傷感，但這份傷感終又隱含著一份癡迷。至於都城歷劫之後，南朝寫作者則曾從各種面向，寫

<sup>24</sup> 鄭毓瑜《文本風景》，前面已經提到〈名士與都城〉、〈市井與圍城〉這兩章對筆者寫作本書之重要啟發。

<sup>25</sup> 此句為陶淵明〈歸園田居〉之四，引自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992。由於本書引用六朝詩歌繁多，同樣為避免註腳繁複，其後僅注逯輯與頁碼。

出他們所感受、想像或再現的毀滅進行式。

第三個對本書而言相當重要的專著是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以及其〈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sup>26</sup>的論文，本書的第五與第六兩個章節，很大程度就建立於王文進這些論述基礎之上。在當時王氏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時代背景，即是當時士人在「州府僚佐雙軌制」之下，經常有宦遊、流寓的經驗與機會，那麼，江州或荊雍地帶就成為他們親身履跡、活動的空間。於是有了對照的經驗來看待都城所在的揚州。當然，本書仍然有不同於王氏論述之處。首先筆者聚焦幾位確實有荊州、江州旅居經驗，並具備足夠文本的作者；其次筆者的探討並不僅止於詩歌，辭賦以及其他文類，如《荊楚歲時記》等著作，同樣列入本書的討論範疇；其三就是王文進當時推論的：由於州府雙軌制讓士人有了西方的邊境經驗，於是藉著這樣的邊境經驗去想像兩漢的邊塞圖騰。筆者認為江州存在著一種空間的中介性，文人在長江流徙的經驗，成為他們行旅苦辛的根源，於是形成了一種山水詩歌的新美學。至於荊州固然是國境之西鄰重鎮，但同時相對於都城的中心卻是偏於一隅，因此筆者著重在幾位具有荊州經驗的寫作者其遊戲、遊覽甚至遊仙之作，觀察其作品中呈現的場域變化，以及邊緣與中心的辯證關係。既然本書前半部分以都城建康金陵為考察核心，作為與東方／建康對應的西方空間，自然有值得考察並作為對照組的意義。

至於如田曉菲的《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sup>27</sup>書中最末一章〈分道揚鑣〉(“Parting Ways”)，提到顏之推、沈炯與庾信幾位歷劫者的終局，也給予筆者頗大的啟發，進而關注這幾位經歷浩劫的倖存者，他們所面對的空間想像與創傷經驗。與田曉菲差別最大之處在於，筆者所謂的傷痕書寫，除了親身見證真實的創痛，同時還有一種傷痕展示的意義。但也正因為傷痕需要展示，因此寫作者得以透過各種迂迴或隱遁的敘事方式，來重新整理、再創作這樣的經歷。在這樣的再現、

<sup>26</sup>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7年）；〈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文與哲》第14期（2009年6月），頁55-90。

<sup>27</sup>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此書中文版簡體與繁體兩版本，筆者其後所引主要參酌繁體中文版本（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另徵引時有時對照英文原版，所引之版本為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展示、表演與反饋的內裏，我們觀察到某種異於常態的舞臺性，這又與宇文所安所談的「劇場」經驗以及「世界的讖象」<sup>28</sup>有些關聯。這些討論在本書後文會有更進一步的徵引與說明。此處略而提之。

如果我們將這些前行研究文獻視為一種場域或空間本身，那麼本書的寫作同樣是一種空間突圍的嘗試。但即便再怎麼突圍，進入場域之外，卻可能仍難真正逃逸於前行文獻所組織的網羅。那麼，這樣的研究同樣也是一種被「包含在外」的嘗試。然而就筆者的預設，本書仍然有所突破之處。就第一部分來說，過去我們知道金陵是六朝的都城，而當其滅亡成為幻空或幻美的存在。但本書嘗試用「神聖」、「安全」、「繁榮」三個面向對其都城意義進行檢視；就第二部分來說，過去我們也會談到侯景之亂對建康的浩劫與摧毀，但本書嘗試實際舉出受到此浩劫波動所影響的寫作者，觀察他們的毀滅紀實以及創傷回溯。就第三個部分而言，我們過去以「南北朝」來斷定西元三至六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但即便位於江南的王朝，仍然有所謂的「東／西」之別或「東／西」之辯。本書嘗試將江南內在的空間差異顯題化，並放回中心與邊緣的都城研究脈絡。

不過從更文學性的語言來說，一切語言、立場與靈光，都可能有蹈襲模仿的成分，所有的作品與研究成果，都處於這個時代之中，那麼也難以逃脫於抄襲這個時代的可能。筆者基於前行研究者巍然的身影之下，希望提出絲毫新意，重新看待南朝寫作者筆下對空間，對時間，對記憶的書寫與響亮，更希望觀察他們複雜猶如一座城市的心靈狀態。

#### 四、小結：空間的想像與紀實

由於前述的「人」與「空間」，共構成了複雜又密切的互動關係，筆者這幾年的研究大多聚焦在這些六朝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城市、州郡等空間地景。依附於同一空間的寫作者，由於不同時代或脈絡，創作出各種風貌的文學作品，再現他們所

<sup>28</sup> 關於宇文所安的論述，在本書中筆者最主要參酌氏著，李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王堯、季進編：《下江南：蘇州大學海外漢學演講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以及其《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之讖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感受的空間觀，而反過來看，當這些地景消沉在萬古荒流之中，這些文學作品反身構成了我們認識空間與城市之本身。

這幾年亦有學者透過實地研究的方式，觀察一空間或場所的景觀變遷，溫度、濕度、氣候變化等等，對文學作品進行補充與詮釋。這些實際的繪測與成果，筆者同樣拳拳服膺，但我們可能應該思索的另一面在於——如果說文學作品原本就內建有想像的程式，就有點類似《文心雕龍》說的：

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夸飾〉）<sup>29</sup>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神思〉）<sup>30</sup>

無論是刻意的誇飾是雕琢，或是神思遊於外的超越與想像，或對作者來說這種「想像」與「再現」，恐怕已經混淆了他所認知的現實。換言之，文學有一種超越真實而再現的可能。那麼，筆者認為全然相信在地的實測所得的觀點與結果，同樣可能未必等同於事實。這也就是本書在此處所提出的——「真實之城」與「想像之城」最主要的命題所在。無論我們再怎麼逼近真實，其內在仍然有想像的成分，那麼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將這種想像與真實結合成的迷濛幻境，當成研究對象本身。即便它可能是偽造的，是不客觀的，與現實的時間、空間、距離、溫度、氣候……等等的變因，完全不一樣，或全然出於寫作者想像。探討想像之本身，探討再現的過程，這同樣是探討文學與空間最細膩複雜的肌理所在。

或許我們應該進一步來說——當文學研究鑽研追究到最後、最深刻的部分，其實某種程度就是在探問一種「不客觀」又「不科學」的記述與技藝。而也正因為這些不科學，讓最高境界的文學作品，有了一種歧異性、複雜性，或我們經常說「詩無達詁」與「不可解」。這不僅是過去詩話論詩所謂的「詩有不可解，不必解」<sup>31</sup> 這般空靈禪機而已。因為現實人生是如此繁複而不可解，那麼文學作品自然得呼應這

<sup>29</sup> 劉勰撰，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 132。

<sup>30</sup> 同前註，頁 105。

<sup>31</sup> 此乃明代謝榛於《四溟詩話》的說法，此處僅作為舉例一提，對此並無深究之意。

樣的不可解。而這也正是文學研究有異於其他學科之所在。

這幾年學界有一個說法，有說研究有所謂「有無之論」與「差異之論」的分別。確實，相較於科學研究，或特定的出土文獻與聲韻現象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有」或「無」的鐵證如山。但文學研究有時只是不同立場所見、不同詮釋，甚至只是不同視角所造成的不同光影折射，而有所詮釋面的差異。然而筆者並不認為立場不同，所得到的不同成果，僅止淪為多元詮釋而多事寡功。文學作品一如寫作者的心靈，如一座鏡城不斷亂反射，各種影像不斷投影、重層、疊映。那麼，多了一種詮釋路徑，我們其實也就能夠更貼近寫作者的複雜心靈所形成之歧路迷宮。接下來，筆者將就前述的三個大架構，分別展開論述，希望能探究這些猶如心靈圖景般的、阡陌交織的城市與地景，探問它們被書寫的策略與意涵，以及背後代表的每一位寫作者深刻複雜的隱喻和心態。